

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

——中美学者「黄门对话」集

傅刚 主编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

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

——中美学者“黄门对话”集

傅 刚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黄门对话”集/傅刚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

ISBN 978-7-301-27861-1

I . ①中… II . ①傅… III . ①古文献学—研究—中国 IV . ①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2997 号

- | | |
|-------|--|
| 书 名 | 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黄门对话”集
ZHONGGUO GUDIAN WENXIAN DE YUEDU YU LIJIE |
| 著作责任者 | 傅 刚 主编 |
| 责任编辑 | 翁雯婧 |
| 特约编辑 | 王紫薇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7861-1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zpup@pup.cn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694 |
| 印 刷 者 | 北京大学印刷厂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8.25 印张 250 千字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50.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弁 言

傅 刚

2015年9月10日—11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心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举行了一次“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对话”学术讨论会,由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就中国古典文献阅读与理解方面的意见,进行面对面的学术对话。会议召开的起因,与中、外学者在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不断产生不同的意见有关。近年来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与世界学术联系并对话,已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重大课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学术隔膜的状态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变,窗口打开的目的,开始是为了了解外部世界,而随着了解的深入,则想参与进去,并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中具有自己的发言权。但要想做到这一点,则需要与海外的学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应该说,在当今,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进行学术的平等对话,也越来越深入。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我们仍然发现,即使是今日,这种沟通和交流,还很难达到深入的地步。这里面有一些客观的原因,更有学术观念、方法等方面的原因。在一些中国学者熟悉的文献和研究领域中,中国学者往往与海外学者具有很大的分歧,也因此会产生很多的误解。究其实,还是与沟通、交流有关。为此,我们觉得可以先与美国学者通过小型会议的形式,开展直接交流,主要是理解彼此的学术理念、方法以及研究的依据。学术研究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需要沟通和理解,这样才能将学术研

2 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

究深入进行下去。于是我们申请了北京大学研究生院“黉门对话”项目,邀请到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学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家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以两天的时间,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学术讨论。参加会议的专家均提供了高质量的论文,讨论也非常深入,尽管彼此往往有不同的看法,但交流、理解的目的达到了。此次会议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国内学术界的反响也很热烈,我们也觉得应该将会议的成果出版,以更广泛地向学术界介绍,学术界也能够通过论文来认识和了解我们的想法。这次会议还是一个尝试,今后我们还会以不同形式更深入地交流和讨论,目的都是为了推进中国学术的发展。是为弁言。

2016年9月3日

致 辞

葛晓音

各位学者：

今天，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协办的研讨会“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和理解——中美学者对话”正式开幕。我先代表北大的同事们，欢迎不远万里来到北京的美国同行朋友们，欢迎国内的各位专家学者光临这个盛会。

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积累了大量文献资料，也形成了自己的治学传统。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学术方法受到西方的影响，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此后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到八十年代又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当时中国内地的许多学者初次走出国门，或者刚接触到西方的学术著作，便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新思潮和新方法，为中国的学术界吹来了一股清风。但是由于很多本土学者不能阅读英文原著，与欧美学者面对面的交流也少，只能机械地套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形成了八十年代中期关于如何认识外来理论和方法的大讨论。经过持久的辩论和大量的实践，中国学者开始认真反思如何处理外来方法和本土学术传统的关系，如何处理文献资料 and 理论研究的关系，逐渐归于理性。在新时期的三十年里，中国学者与海外学术界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结识的学界朋友也越来越多，很多著名的欧美学者被请到内地来讲学，使本土学者对西方学术的理念、方法和学术成果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此同时，新一代学者成长起来，他们阅读英语原著的水平

比老一代学者有了很大的提高。许多在外留学的大陆学生也在西方的大学里成为教师和研究者,他们和国内学者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西学术之间的交流。但是,像今天这样,部分中美学者就一个专题坐下来面对面地进行对话的场合似乎还是第一次。我们相信,这次研讨会开启了一种更有效、更具体地进行学术讨论的方式。

关于古典文献的阅读和理解,是一切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对于文献的质疑和辨伪,从宋代就开始了。苏轼就对李白的一些传世作品的真伪提出过疑问。此后历代都有学者对传世文献进行考校、勘误,形成专门的学问,到乾嘉时期,更是发展到极盛。二十世纪前期,也有不少学者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提出疑古的主张,并且有不少实践,当然也存在着很多争议。而对古典文献的解读,尤其是古典诗歌文本的解释,也从来都存在着“诗无达诂”的现象,西方的接受学说更为这种现象提供了理论的阐释。因此,对于古典文献的不同阅读和理解,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争议。中国早有一句古训:“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只是在学术研究愈趋科学化的时代,在大量地下文物出土的当下,在处理古典文献时,如何做到既要避免盲目信从传世文献,又要避免历史的虚无主义,两者之间的分寸如何掌握,确实应该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这就是这次对话的意义所在吧?

最后,预祝这次对话能开成一个思想活跃、讨论深入、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

2015年9月10日

目 录

中国上古时期文献写、抄特征及其文献学意义	傅 刚/1
关于“文献学”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3
《诗经》的形成	柯马丁(Martin Kern)/18
《诗经》“商颂”、“周颂”韵律形态及其与乐舞之关系	杜晓勤/46
《山海经》的传播及小说史意义	魏崇新/75
《庄子》内篇身心观辨析	张洪波/83
《过秦论》三题	刘跃进/99
从出土文献看汉人对先秦文献的整理与传承	赵敏俐/117
从自然人性到人性自然	
——论郭象《庄子注》对庄子人性观的改造	詹福瑞/123
陶渊明的书架和萧纲的医学眼光：	
中古的阅读与阅读中古	田晓菲/144
写抄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	程苏东/173
《世说新语》在宋代的流播及其书籍史意义	潘建国/191
略谈我读李清照《词论》的经验	艾朗诺(Ronald Egan)/216
复式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	商 伟/223

中国上古时期文献写、抄特征及其文献学意义

傅 刚

一、何为写、抄本

写本,顾名思义,是指用类于笔一类刻划的书写物,在纸、竹、帛等载体上书写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开始时期记录书写的文本,都是写本。当然,事实上中国上古时期的写本因为载体的原因,不可能保存完好,至今能够见到的早期文本,也多是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竹简。再早期的,保留在甲骨以及彝器上的文字,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写抄本不同,这里不做讨论。事实上,写、抄本作为文献学概念,主要是指版刻发明之后,与刻本相对而提出的,它主要指未经雕板的手写文本。至于写本和抄本的区别,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传统的文献学认同,以为写本指发生时代较早,又被后人传抄的文献,还有一些是指特定环境中产生的文本,如明清时期内府抄写的图书,也称为写本。抄本,则指发生时代较晚,主要是据写本,甚至是刻本传抄的文本。这个定义并不科学,不过,写、抄本概念的提出,本来也是版本学家为操作方便,据约定俗成的认识而使用的,并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除此之外,还有人以为,写本应该指作者手稿,所有非手稿者皆为抄本。这个观点落实到唐以前,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唐代以前作者的手稿,基本

上没有存下来。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有一份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手稿,十分珍贵,但这样的手稿,即使在宋代也十分罕见。因此,若对中国上古时期文献写本作这样的界定,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以产生时代早晚来衡定的话,唐代以前存世的手写文献,似乎都可以称为写本。因此,我们对敦煌发现的六朝和唐代的一些文献,多称为写本,就是这个原因。

写本当然很珍贵,它产生的时代远早于刻本,对于我们研究古代的文献,无论在校勘、文本分析上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比如,我们根据敦煌出土的《文选》写本,解决了许多刻本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没有见到这些写本之前,即使是最好的版本学家、校勘学家,如清代的顾广圻,往往把《文选》刻本出现的问题,归诸某一个人(宋代尤袤)以五臣乱善的结果。根据早期的《文选》写本,这些问题其实是在抄写中发生的讹误。这些讹误或者把原为李善本文字错为五臣本文字,或者反过来,把五臣本文字错为李善本文字。还有许多既非李善,也非五臣的文字,因为刻本出现时,仅有李善注和五臣注,而简单地归为或李善或五臣文字。

目前我们能够见到或便于使用的早期写本和抄本,主要是六朝和唐代,由于它主要是针对刻本而言,因此先秦乃至汉代出现的以简、帛为材料的文献,一般称为竹书、帛书,不用写本、抄本的概念,当然如果从写、抄的书写方式看,也不是不可以视作写、抄本。不过。如前所说,写、抄本本来是版本研究者以及藏书家提出作为与刻本相对的概念,明清时期所见的战国以及汉代竹简和帛书,相对说来数量不大,还没有引起足够的研究,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写、抄本并没有对这批竹、帛书文献特征作过认真的研究。应该说战国以及汉代的竹、帛书文献特征与六朝和唐代的写本不同。很简单地,六朝、唐代写本距离刻本近,五代及宋代刻本当然是据唐代写本刊刻的,写本与刻本文字基本相符,异文、错讹字都是可以在校勘中得到解决的。但战国和汉代的竹、帛书则距刻本远了,文字差异可能就要大得多。不过,对这种差异也不能不加区分。比如经书,唐代以前所定的九经、十二经,因为经的地位,凡读书人皆须

读,既须读,则有可以信赖的文本,对于经书文本,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如东汉、曹魏、唐时期皆专立石经,以提供可靠的文本。这就保证了经书文本在写、抄本时代和刻本时代都能基本保持一致。除去经书,史书也比较可靠。某种意义上说,较经书更为可靠。因为经书在上古时期就是史书,史官据有关典籍记载,在略具国家形态的上古时期,如夏、商时期,史官就具有了严格的职责。《国语·楚语》所记颛顼时代史官工作情形,就把史官追溯到了部落时代。因此,我们在中国上古文献的记载中,会读到史官工作的重要以及所掌写文献的严格管理。如《周礼》所记史官执掌,区分严密。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说史官记事,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是古之史官写作皆有规则凡例。先秦史书经秦火而焚灭无传,但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历代史书皆为官修,而史书传播亦有限制,故史书之写本与刻本文字差异亦不应甚大。集部产生较晚,集为个人文集,往往藏诸私家,若非名家,其传写流播不远,但也正因为如此,在唐以前,集部不太受重视,所以完整流传下来的并不易。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影响的文学家陆机,《隋志》载其在梁时有集四十七卷,但至唐时仅存十四卷。改动较大的可能要属子书了,学术界当前利用出土文献对子书的讨论较多,如几种《老子》文本,似乎有不同的面貌,很容易让人得出先秦文献与传世文本不同的结论。但子书文献的面貌与经、史有很大的区别,不可一概而论。子书的兴起在春秋以后,由于书写材料的限制,中国上古时期的文献,大多没有存藏下来,幸运的是,近年来的出土材料说明,上古时期有些深埋在地下的竹、木简和帛书文献竟得以保存,这些文献毫无疑问保留了早期文献的面貌。从这些文献看,它与传世文献不尽相同,这些不同,不尽是文字的异文,有些在结构上也有一些变化。以《老子》为例,如郭店简《老子》,整理者分为三组,其中各章文字与传世本《老子》有的相合,有的只是今本的部分,又其文本不分章,排列顺序与今本及帛本亦不相同,内容只有今本的五分之二。又如清华简《说命》,整理者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但其上、下二篇与伪古文完全不同,当然,伪古文不足论,然其文字全未见先

秦文献征引,这就出现许多学术上讨论的问题了(此点留待下文讨论)。无论如何,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似乎发生了许多不同,这也许就是启发了一些学者对先秦文献怀疑的证据。比如最近几年见到部分西方汉学家对先秦文献的质疑,他们主要依据西方写本的概念和研究模式,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重新审视,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上古文献因为写本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对汉代以后经过整理的传世文献产生了怀疑,认为这些文献不可以作为先秦时期可信材料看待。应该说,西方汉学家提出的这些质疑,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也有他们学术考察的方法和视角,的确值得我们重视,同样针对这些出土文献,为什么中国学者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呢?这可能是中、西学者由于具有不同学术背景而会产生不同视角和不同判断的原因吧。那么中国学者对传世文献的相信以及对相关记载的信赖,其学术依据和方法,西方学者是如何考虑的呢?

我们认为,这是对中国古代学术史及教育史的特点的理解不同而引起的。首先,我们说,在刻本出现之前,无所谓写、抄本,因为假使排除掉手稿概念的话,其实只有一种文本形态,即都是抄本在流传,除了载体的材料有区别外。中国上古时期的文献可信吗?是否如持这些观点的学者所说的,是经过了汉代学者整理,已经不能作为先秦时期可信的文献了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特征、流传的途径、流传中改动的可能性等进行讨论。

二、中国上古时期写、抄特征

在刻本出现之前,所有文本只能依靠写、抄手段传播,在纸张发明以前,主要的载体是竹、木、帛等,竹简呈条形,尺寸在秦汉以后有规定,如蔡邕《独断》说策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文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秦汉时皇帝制诏之策书规定使用的尺寸。又有牍版,其形制略宽,可以多书文字。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说:“《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

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孔颖达《疏》说：“版广于简，或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乃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是其字少则书简，字多则书策。”六经在荀子时已经被尊为经，故六经的地位当然高于其他典籍。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郑玄《论语序》说孔壁所出简，《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可见经书尺寸与别的典籍不同。根据中国古文献学研究习惯，这些竹木简书，一般不称写本或抄本，写、抄本似乎专对纸质材料而言，当然，就文献的本质而言，这些也都是写抄者留下的文本。“本”的概念，最早出自刘向，《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义》：“按刘向《别录》：‘讎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刘向中秘校书，每种文献均广搜多种异本，一人持底本，一人读异本，两相对照，校异刊谬，以成定本，然后再抄写到帛素上，《太平御览》卷第六百六十引《风俗通》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校异刊谬，无疑是刘向校书的主要目的，完成定本后，刘向再写成书录，即《别录》。我们现在留存下来的部分《别录》可以看到刘向校书工作的几个过程：校书所用本的情况、校勘过程、该书的篇目内容、书的性质等，都作详细说明。但就《别录》所说的“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看，这个“本”，本意是木根，这里指竹木简，“读书”的“书”，则应指文字。刘向整理中秘图书，不仅有汉时隶书文字文本，也有秦及秦以前用不同文字所书文献，《魏都赋》说：“讎校篆籀”，是说讎校文献要辨认篆籀等不同书体，但辨认书体是校勘的第一步，校勘异文、整理书简、编排目次皆是刘向校书的工作，因此虽然说是“读书”，实则兼言校书的全部工作。但汉人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简和帛，简为书写工具通称，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南史执简而往，史官记事于简、策，故其文本又称简书、策书，刘向整理图书，或称篇，或称卷，篇为简书，卷为帛书，故校讎者所执之简、帛书，实应称“一人执简”，此为何不称“执简”，而称“执本”呢？以“本”代指书，前似无此例，是知刘向《别录》专门为校讎一事立

“本”名，乃在强调同一文献的不同本的区别，以及校刊这些区别的重要性。

刘向父子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在朝廷的主持下，对典籍进行大规模整理的人，这个整理说明先秦以来的文献经过了汉代学者之手，但是否可以说，经过汉人整理的文献就不再能反映先秦典籍的原貌了呢？这其实不能一概而论。不错，自秦焚坑之后，除民生实用之书及法律条令等，先秦以来的经、史、子多被烧掉，不过，《史记》记秦始皇焚书时有一句话“非博士官所职”，则秦时博士官所用书及朝廷藏书并未被焚毁。其后项羽入关，焚烧咸阳，或谓秦所藏书，一并烬于项火，然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刘邦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是秦图书经萧何而略有保存。当然，萧何县吏出身，于儒家经典，或不尽意，故汉廷建立之后，五经所出，颇赖民间学者。《史记·儒林列传》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绝矣。”是见经书的确绝于秦火。《后汉书·徐防传》记徐防太元十四年上疏曰：“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是汉时典籍呈现与先秦文献不合，大盖因秦火的关系。

先秦的经、史文献由于秦始皇焚坑的原因，基本失传，至汉代逐渐从民间收集恢复，《汉书·儒林传》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虽然“大汉初定，日不暇给”（班固《西都赋序》），未能加以整理，但朝廷图书应该有所收集，《汉书·艺文志》说“迄汉孝武世，书缺简脱”，则见武帝时图书虽未加整理，但规模已具。以五经为例，虽然汉文帝时才立《诗》学博士，但《诗》之传却自战国以来并未绝灭。如鲁诗，建立人是申培，申培老师是浮丘伯，而浮丘伯老师则是荀子，是见《诗》之传自战国至汉初并未中绝。再如《易》，《汉书·儒林传》说：“及秦焚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此见《易》在民间存传不绝。《史记·儒林列传》说：“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

绝。”这些都见出秦火其实并未尽责焚尽儒家典籍，否则，鲁中诸儒以何讲诵习礼乐？

以上所举说明中国上古时期的典籍学习和传承，是有很严谨的学术传统的，这个传统同样规定了文本的严谨性。我们不否认文献在以写抄本流传的上古时期，肯定存在因转写而造成的讹误，同时，各地语言的差异（参见杨雄的《方言》）以及通假字、异体的使用，都会给文献带来讹变，但在根本上应该不会造成文献的大差异。比如《孝经》，据《汉书·艺文志》，汉初所传各家经文皆同，但孔壁所出古文字读则有四百多字异文。又如《尚书》，今文与古文在文字上有异文，但相同的篇目似未听说有太大的差异。文字的差异，主要是传写过程中文献有阙，而后学者不懂存疑的道理而臆改原文所致。《论语·卫灵公》记孔子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孔子懂得文献不能轻改的道理，但后学者却往往自以为是，以私意改动原文，故使文献失真。这在上古写本时代应该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上古文献的真实性。很简单的事实是，自西周以至秦汉，中国古代的教育有严格的制度，文献记载，夏商周皆有学校，名称虽不同，但性质相类。西周时有大学，有乡学，学习礼乐射御术数及《诗》《书》等文献，既有学校，则教材及教程皆有定式，若无固定教材，师傅如何教？学生如何学？上古文献中常见于外交、政治场合中征引文献，一是这些文献有价值，能够服人，二是人人皆熟悉这些文献，故征引者所言文献之意，听者了然于心，若文献不定，人人异本，如何能够起到沟通交流之用？《国语·楚语》记申叔时对楚王问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此是太子所学内容，则见《春秋》《诗》《书》《礼》《语》《训》《典》等文献，皆有定本。又观先秦典籍如《左传》及诸子，所引《诗》《书》诸文献，

往往相符,亦皆见文献有定本。前所举出土文献《老子》等,其篇第次序似与传世文献有异,其中原因甚多,所定是否合于先秦文献,亦在讨论之列,固不可据今人整理之本而论先秦文献是非。前所举《尚书·说命》,实存在有不少疑问,比如整理者自行将文献命名为上中下三篇,是否先秦时期《说命》已经分篇?且是上、中、下?其次,三篇篇末皆有背题“傅说之命”,是否就是《尚书》中文献?其三,上、下两篇皆不见先秦文献所引之《说命》,此如何解释?当代学者对出土文献的整理,是否能够真实反映先秦文献的原貌?如此等等,因此,若据此即判定上古文献无定本,似失之粗率。

西周时期的学制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至春秋时期,自孔子始,官学下移,于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就传世文献看,一家之中有杂入别家者,如《庄子》外篇中就杂有别家的作品。传统的解释是,这些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掺入了别家文献,据当代出土文献材料看,似乎表明在先秦时期的学派发展中,各家界限并不十分严明,如儒道思想并不像后世所了解的那样界限分明。学者多举《老子》为例,如今本《老子》十九章中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句,楚简《老子》为“绝智弃辩”、“绝伪弃虑”。因此学术界认为,老子实际上并不反对“圣”,也不反对“仁义”,这样的研究为我们了解中国学术思想发生初期的真貌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促使我们要对传世文献重新审视,这是很有益的,但是,若如此便一概而论,认为先秦所有的文献都是这种情况,可能失之偏颇。

在传统的四部文献中,集部产生的晚,经部虽然是汉代才正式建立的,但若从经者常也的概念出发,上古时期的五经文献,也就是读书人常读的五部书,我们姑且把经部算作一类。这样看,经与史其实与子书具有很大不同。五经中的《诗》《书》《易》,先秦文献征引较多,如前所论,这些文献应该是有定本的,是为各家所熟悉的。史书是官书,史官有制度,书写有例法,一般人很难接触到,更不可能私自抄写,故周史及诸侯史乘,理应无此类问题。这样看来,唯有子部。盖子部系学术下移后产物,百家争鸣,当孔子时尚述而不作,至孟子时始记其退而著书。孔子之言,赖弟子记录,是

难免有异文,《老子》据出土文献,有老聃和太史聃两个老子之说,老聃比孔子还早,据说他写了简本《老子》(郭沂《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太史聃写的则是今传本《老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不可据以证明先秦文献没有定本,因为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作品,理应不同。但老聃在孔子之前,就躬自写作五千言文本,这种学术写作比述而不作的孔子还早,似乎仍然存有问题。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即先秦时期的文献传播,有没有地域性差别?比如楚地掌握的文献,与中原地区的文献是否一致?道家的文献,多出于楚地,儒家文献则多出于中原,儒家文献传到楚地,会不会被修改?同样,楚地文献传到中原,会不会受到中原人的修改?现在出土文献多出自楚地,是不是与中原所传文献本来就有一些差别?如果有这些差别的话,今天出土文献多是楚地文献,是否便能代表先秦文献的真貌?即如前引《老子》简的问题,战国末如庄、荀、韩对先秦学术的看法,以及汉初学者对儒、道不同学术特征的认识并不相合,我们如何便可据出土之一支简就认定先秦儒、道不像汉人所说的那样对立呢?

春秋末期,以孔子为标志,私学兴起,因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从汉人的记载看,先秦时期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特征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可见先秦时儒道两家学派之壁垒森严。近年来,学术界往往根据出土文献谓儒道两家关系,其实在早期并不很对立,对此,我以为仅据一种出土文献就否定司马迁的说法,或据一种出土文献就想概括先秦时的全部文献,依据还不足,因此下言要慎重。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先秦乃至汉时,不同的学术门派间,学术思想并不混杂,我是相信这个看法的。中国古代学术教育和传承,一直有稳定的传统。《荀子·荣辱》篇说:“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杨